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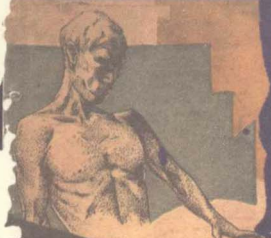
Jasmine 佳思漫
好思想漫世界

半月刊
第一期

寧
衡

THE CRITICAL REVIEW

No.1 January, 1922



藝

一卷二期

華
談

寻找失踪的

民国杂志

◎ 韩晗 著

纸上风流，笔下硝烟
揭秘民国杂志圈的文人旧事
民国文化生态“窥豹”之作
国内首本关于民国杂志“失踪者”的钩沉性著作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寻找失踪的

民国杂志

◎ 韩晗 著

纸上风流，笔下硝烟

揭秘民国杂志圈的文人旧事

民国文化生态，窥豹之作

国内首本关于民国杂志的钩沉性著作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文坛泰斗、学界巨子,为何主编的刊物均是昙花一现?是社会的人文衰落,是读者的有眼无珠,还是内部失火?

傅雷、周煦良等学者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旗下云集了钱钟书、马叙伦等诸多名家,该刊仅办几期便成绝响!《絮茜》既不左倾,又对右翼文学没有兴趣,站在“第三党”角度的文化人,有着怎样的诉求?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实质上并非广受欢迎,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只是采取商榷的态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新青年》“被中心”呢?

本书作者亲自查询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文献馆藏,并采访到邵洵美之女邵绀红、傅雷之子傅敏、老作家黄宗江等见证人,以珍贵的历史图片、流畅的文字,再现民国杂志风采,填补了学界研究空白。

一段历史,几本杂志。众多文人,一点痕迹。纸上风流,笔下硝烟。世事变迁,落尽繁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韩晗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09-7742-3

I. 寻… II. 韩… III. 期刊-研究-中国-民国 IV. 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9973 号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

韩 晗 著

监 制:段 勇

策划编辑:吴安宁 杨 静

责任编辑:吴安宁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3 插页:2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马燕红

责任监印:周治超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开垦学术的处女地

——序韩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

樊 星

韩晗出生于1985年,属于“80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喜欢写诗、写小说的不少,喜欢研究文学的似乎不多。而作家陈应松在向我推荐韩晗时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指文学研究),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真的不多!”后来,我了解到韩晗已经出版了散文集《大国小城》、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等多种,更感到应松兄此言不虚。这不,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入学不到半年,韩晗又拿出了他的最新成果《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并告诉我,其中的几篇已经或即将在《书屋》、《汕头大学学报》等刊发表。借此书出版之机,韩晗希望我能写篇序言,我当然乐意玉成此事。

期刊研究、文学的传播研究都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关于那些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韩晗一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一面迅速进入了对于那些学界一时尚未关注的期刊的研究,通过对原刊的细致阅读、研究,有所发现,从而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例如《絮茜》、《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呐喊(烽火)》这些学界的研究显然还不够的刊物,韩晗都能拂去历史的烟尘,还其清晰的历史面目,揭示其在历史上也许不那么深远,但不容忽略的文化意义。这样,这本书就具有了某种拓展新知、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韩晗有意在

对于不同期刊的研究中剔发不同的文化意义,努力呈现出对于期刊研究的多侧面理解,也使得本书具有了摇曳多姿的灵动感。此外,更有意义的是,韩晗能够走入历史的深处,去理解那些前辈文化人的追求与迷惘,去发掘那些好像已经湮没在历史废墟中的文化陈迹,我觉得是显示了一个“80后”学人对于前辈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显示了文心的薪尽火传。

现在有不少青年学人,常常习惯从某一西方的流行理论入手去讨论问题。然而,西方的理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却是一个问题。甚至在西方,对文学评论的理论化倾向的质疑也时有所闻。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就曾经指出:“当前迫切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①因此,如何从对于文本的阅读感觉入手,去感受、描述文学的丰富与微妙,进而深刻领悟人生的丰富与微妙,就成为避免沦为流行理论附庸的关键所在。我在读了这部书稿以后,感到韩晗既能关注新的理论,并从中摄取研究的灵感,又能不为理论所囿,努力还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多变,读来常有移步换景之感。例如《“遗失的美好”》一章对《絮茜》月刊的研究对于“三个张资平”、“两个《絮茜》月刊”的发现就颇有新意地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多变。《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一章中对《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号”特色的发现——“‘重中轻西’、‘昌明国粹’仿佛是《季刊》的办刊宗旨——这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要撰稿梯队的刊物似乎十分不符”,同时这一现象也有特别的文化意义:“恰恰因为有着一群优秀的留学生(尤其是欧美留学生)供稿者,他们既有着西学的视野,又有着国学的底子”,做起“昌明国粹”的事业来才别具特色……都能体现出作者从史料的钩沉、分析入手,去重新发现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人物的命运多变的求实精神。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还原历史的复杂绝非易事。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问题、人事纠葛缠绕在一起,没有深厚的学养,是难以透彻地做到“知人论世”的。而深厚的学

^① 韦勒克:《大学里的批评》,《外国文艺》1987年第4期。

养,当然是建立在常年的积累基础之上的。由于作者毕竟年轻,虽然在对于那些“冷门”期刊的研究上能够有所发现,但当他试图“以点带面”评论那些错综复杂的思潮时,有时难以做到深处,就显示了作者之短。例如书中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唯美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评述就明显有简单化之嫌。因此,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还是需要进一步打磨的。我相信韩晗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既然他真心地喜欢学问。而且,他还如此年轻!

2010年12月24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 导论 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
——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一
- 第一章 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
——以《新语》半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辨 /一五
- 第二章 “遗失的美好”
——以《絮茜》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辨 /三一
- 第三章 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
——以 1930—1937 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
学术考察 /五三
- 第四章 狮吼声何处
——关于《狮吼》杂志及其后期文学活动史料考 /七八
- 第五章 “怎样遗忘,怎样回忆?”
——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 /九八
- 第六章 “被中心”还是“被边缘”?
——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一一八
- 第七章 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
——以《笔谈》杂志为核心的史料考察 /一三三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

第八章 烽火中的呐喊

——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一五一

补记 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 /一六九

第九章 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

——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 /一七五

余论 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建议与思考 /一八九

后记与致谢 /一九九

导论

建构“群像式”的 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

——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历史往往隐藏于假象的背后。

——吉奥乔·阿甘本

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是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马泰·卡林内斯库

“二十世纪文学史”^①是一个近些年曾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与高度关注的词语,此语与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现代文学”这一名词在内涵上几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学史研究上的积极意义,进而认同五四时期不但是现代文学的逻辑开端,更是当代文学的精神来源。若是套用李泽厚的话来讲,就是“启蒙压倒革命”。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所在,尽管不断有现代文学学者一再上溯现代文学之逻辑起点为晚清甚至更早^②,但他们谁也无法抹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价值;同理,我们也不能刻意忽视“1949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纵然信奉“二十世

① 内地现当代文学学界对于文学的概念定义时常会陷入“时间性修饰”,即使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来定义文学,而这种定义恰恰因为片面性、粗略性而缺乏严谨的合法性。譬如当今“80后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等,实际上这类界定关于“文学”这一特定语的修饰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定义这类定义所包含的文学范畴,因为文学的发展并不被人为的时间、国界所限定。

② 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王德威先生对于文学史发展先承后续关系的认定,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理,“没有现代,何来当代”亦构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关系。“当代文学”虽与“现代文学”属于两条不同的路数,但是1949年作为一种政治年代的符号,改变的是文学的精神能指与意识形态代言,却未改变文学自身的叙事范式、结构策略与表达形式。

纪文学”甚至“现代文学”就是“当代文学”^①的学者，也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中国文学确实在1949年此处有一个转弯，并且是大转弯。

笔者认为，转弯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遂由一条大路分成了两条路：一条貌如“金光大道”，却与前路有着九十度的转折，内地学界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另一条看似“通幽曲径”，但却是前路之精神延续，内地学界称之为“港台文学”。两条道路，各有千秋。

问题不言自明，“1949年”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其意义究竟为何？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无数本不同的文学史教材中找寻到五光十色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并非都指向问题的本质。研究界对内地“现当代文学”分野之态度实质上印证了他们对于政治与当代文学生产关系之态度。因为大部分研究者们都认为，1949年之后，政治开始对文学进行全面干预，使得五四时期建立的“文学道统”迅速瓦解，文学不再具备其应有的启蒙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红旗歌谣》式的诗歌、《金光大道》式的小说与“样板戏”式的戏剧。政治将文学全面解构之后，使得文学不但“告别五四”，甚至还走向了反面。

正视并否定“左倾”思潮对文学的干预，这是必须的前提。但我们本身不应否定一段过去的“历史”。海登·怀特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学是“可叙述”的文本，而历史是“不可叙述”的文本。事实上，历史同样是“不可否定”的文本，我们只能否定某种思潮、某条理论、某个具体的方案或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一段由人类群

① 关于“当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目前在海内外研究界有三种不同的英文翻译，实际上暗含了对待“现（当）代文学”这一特定内涵的三种不同认识。其一是“modern literature”，这个词组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的直译，意味着具备“现代性”意识，即与启蒙、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文学；其二是“contemporary literature”，这个词组则意味着认可“当代文学”具备共时性、开放性这一特质，并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入手点；其三则是“mandarin literature”，直译为“白话文文学”，目前这个译法在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学术界比较常用，主要指白话文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该译法一般暗含了认同“现（当）代文学”在语言、文字上的现代特征。

体所共同创造的时间维度——譬如一棒子打死“80年代”、彻底否定“晚清”以及认为“十七年”一无是处。

再将思考重新回归到问题本身上来。对于“现当代文学”之分野，我们既不必横加批判，也不必故作无视，1949年之于中国文学之意义，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也绝非一两位学者甚至一两代人可以定论。作为生活在“当代史”中的我们，面对已经存在的时间分野、历史现象，最有效的解读策略便是在研究范式上寻找突破——对于1949年之前的文学，我们该如何研究？对于1949年之后的文学，我们又该如何研究？

笔者认为，1949年这个时间概念，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文学的生成机制，而在于对于其的研究、解读机制。因为从长远的大历史观看，1949年与万历十五年、贞观元年一样，都是一个历史长河中的年份。我们无法去否定远古洪荒，亦同样无法否定已经逝去的“现代史”，因为，它们都是已经逝去的“历史”。

说通俗一点，所谓“历史”就是爱·伦坡《红魔假面舞会》里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

“他们，都不见了。”

二

就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为叙述方便，下文将统一将此叙述为“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式而言，目前学术界并未对其提出明确的质疑或是界定。更多的学者用“二十世纪文学史”这个宏大命题来消解1949年这一时间分野，使得现当代文学史在同一个研究范式下进行。当然，笔者并非批评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在这里，我想小心翼翼置喙的是：在名目繁多的研究方式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来分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作为现当代文学分野的1949年，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影响到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笔者拙以为，这一问题首当从“失踪者”来回答。

所谓“失踪者”便是后来文学研究者缄口不提的作家、作品、思潮与现象。谁也无法否认或逃避，现代文学短短30年，诞生出了一大批巍巍在上的经典作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田汉……他们不但以英雄的表象出现在从小学到博士的教材里，还以经典的扮相、大师的形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远看宛如复活节岛上的巨石阵，使人不得不高山仰止、膜拜不已。纵观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屈子歌赋、李杜诗篇以及三袁文章，有谁可与文学旗手鲁迅先生相抗衡？

但是，与此同时也诞生出了一批失踪者：邵洵美、李贲华、向培良、张资平、章克标、丁嘉树、罗隆基、许君远，甚至包括近十余年之内“走红”的梁实秋、周作人与张爱玲……与经典作家们不同在于，他们已然在之前甚至当下的研究界“失踪”——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文字、生平甚至姓名均不见于当下的任何资料。现代文学“失踪者”何其多也，短短60年，部分主流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们“拐卖人口”的水平恐怕连最牛的人贩子也难以望其项背。无怪乎一位本科生向一位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请教“罗隆基是谁时”，这位老师竟汗如雨下，最后以“不该问的别问”草草收场。

勿怪这位老师水平低下，现代文学史中“不该问”的问题恐怕每一个文学史家心里都有一本账，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不该问、“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论战时站错队伍的不该问、参加过“三民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也不该问，1949年之后被打成“右派”的更不该问，在前些年甚至连胡适、罗家伦与傅斯年都不该问——理由竟是他们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粗粗算下来，“该问”的也就只有从“左联”的鲁迅到“延安”的赵树理等寥寥数人。不过，至于“左

联”，千万也不该详问，因为若是有聪明点的学生问起鲁迅骂周扬的原因，恐怕不知哪一位倒霉的老师又要“汗如雨下”了。

“失踪者”如此之多，为后来研究者平添许多困难。无怪乎研究者们常常感叹：文艺思潮研究常是“掐头去尾”，关注某个文学争鸣最后才发现“有始无终”，史料研究到了一半断了线，仿佛看悬疑小说看了高潮没了下文。对于一些人或事，要么被以“反动”、“政客”甚至“特务”冠之，要么在官方的文学史里索性不提——想当年，谈唯美主义不提狮吼社，提民族文学不论及《现代文学评论》，研究民主党派对现代文学体制的影响却避开《絮茜》杂志……凡此种种，竟已被之前的主流研究界视为常态。时至今日，与“极左时代”相比，话语环境确实宽松许多，某些话题相对已经不再是禁区，但是关于其史料也匮乏、散佚了。

在大量“失踪者”产生的前提下研究现代文学，实际上违背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所谓文学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结合，说细一点，历史学研究方式是方法论基础，而文学研究方式（如文本解读、意识形态分析、审美分析等）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楼阁，若无充分的历史学研究训练就贸然闯入文学史研究，好比是没有学过解剖学的医生给人动刀，导致的结果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瞬间死亡”——因为一手资料一旦被发现，研究者就面临不断“被商榷”甚至“被否定”的结果，而被研究者却因为各路英雄的“各样研究”被涂抹到如京剧脸谱一般，越描越花，离真容越来越远。

时至今日，现代文学研究被后学者视为畏途。相比之下，当代文学研究反倒成了一块热土。因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属于“红旗下”甚至“春风里”的文学创作，且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对于出版体制的管理尤为严格，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少有被争议之作，而且作家作品都好找到，并且健在者为多数。而现代文学恰恰与之相反——出版管理政策松动，多数刊物没有“刊号”，作家学者编辑者们意识形态不一，且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意识形态多元化，从

文者们投延安毛泽东者有之，投重庆蒋介石者有之，投南京汪精卫者也有之。如此看来，大家都“弃现代”而“奔当代”便不足为奇了。

三

问题不言自明，1949年之于现当代文学最大的意义，便是导致无数“失踪者”的产生。但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必须要像做历史研究一样“回到历史现场”——尽力找回这些失踪者，若是找不到失踪者，研究只能靠并不可靠的“二手资料”，而这却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讳。因此，我常常天马行空地遐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若是有人故意（或是无意）在自己某篇论文里造假史料，岂不是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要害苦后面靠“二手资料”吃饭的人？

与我持同样想法的人应不在少数，所以研究现代文学的风险之大，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但与其他文学专业相比，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仍不可小觑，每年硕博毕业论文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数以万篇，洋洋洒洒涉及他们可以触及的各个角落，无怪乎钱理群教授称现代文学为“贫瘠的矿区”——因为关于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专题研究，已然成为“鲁学”、“郭学”的庞大梯队，甚至许多受他们影响的二、三流作家也都相继有了评传、年表与相关研究专著。

但是事实上是，当下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竟近似天文学界对宇宙研究状况：对于已知的，耳熟能详，成了常识；对于未知的，白纸一张，并且也懒得再去过问。因为“现代文学”目前最为多见的三种研究方式，大大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通史研究法。此类研究法为国内各大高校、研究所在编写教材时普遍采用，开口提五四新文化运动，谈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大体沿用之前已出版文学史的惯例，只看大局，不管细

节,只说知道的、该说的,避讳不知道的、不该说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社、“左联”到抗战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路下来,就是一本看似壮观的现代文学史。进而大量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界呈现出了如房地产界的虚假繁荣。

当然,这种研究法的最大好处就是洞观全局,避免以偏概全的主观性。但是这却是一种非常简便的研究法,就像是为中小學生编写《上下五千年》一样,并不需要丰富的史料与学科知识作为支撑,知道是常识,不知道是谜案,正所谓“子不语是非争议”是也,找准一条历史线索,赶知道的写上去,这便是该研究方法带给后学者的困境。

第二种方式是作家作品研究法。“搞现代文学研究,跟着作家作品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们最为常用的方式,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靠对老作家的研究、关注以及评传撰写进入文学研究界,待到成名之后,便不再去过问这个为他们所用的课题,譬如田汉之于朱寿桐、曹禺之于田本相以及鲁迅之于汪晖等,在他们之后,“曹学”、“鲁学”阵营纷纷崛起、壮大。

这类方式的好处便是可以对一个作家形成“传记式”的研究,但是其最坏的影响就是此研究方式一旦蔓延到了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抹杀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逻辑界限。王安忆、余华与韩少功等健在作家的身后都跟了一群群的研究者,一本本的研究资料层出不穷。一种文学研究方式贯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大领域,无疑会使得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界限模糊不清。

第三种方式是理论前置研究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崛起于80年代的“重回五四”,兴盛于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在21世纪,虽然有不在少数的学者视现代文学研究为畏途,但是仍有一些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学者,将目光投射到了仍然颇为热闹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勃兴的“后现代”开始,到“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神话原型”等,理论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这些理论不但可以解读当代文学,试图让中国当代文学与国际文学研究接轨,甚至还有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解读屈原、李白——更多的是被应用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如鲁迅作品中的解构意识、萧红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与戴望舒等——当然这未尝不可,本身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下影响产生的,即“作为他者的现代性生成”,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传入到 1949 年前的中国,无非是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等十来种,新批评、女性主义虽有引入,根本未成气候,更对作家无甚影响。看看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被用到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有时笔者都不禁感叹:怎么现在一下子弄来了这么多?

虽然文学本无疆界,经典不惧历史,但是这些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起到应有的文学史研究效能?很难说。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兴盛,这类研究方法被发展到了极致,在某些批评家的笔下,川端康成可以与钱钟书横向比较,莎士比亚可以与郭敬明纵向研究,所得结论亦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忍俊不禁,正所谓是“没有不能比,只有不敢比,有了好理论,管他作家在哪里”。于是乎,某位地方文士的杂文在一些青年学子的笔下开始有了“后殖民”的视野,一些本属文学爱好者的退休干部,其诗文竟也被咀嚼出了“后结构主义”的特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学研究进入到如同化妆师甚至整容医生的境界,真不知兰色姆、福柯等经典西方文学理论的作者在九泉之下望着东方的文学批评界是否会呼天抢地、捶胸顿足?